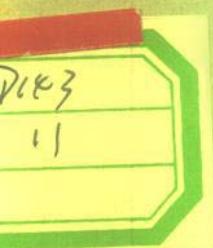


今日社会民主党的 理論和实践

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供内部参考)



今日社会民主党的 理論和实践

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何 疆、王 禧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d. Bernstein
DIE HEUTIGE SOZIALDEMOKRATIE
IN THEORIE UND PRAXIS

München bei G. Birk & Co.

根据慕尼黑比尔克出版公司德文第二版译出

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和实践

(德) 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何 疊、王 福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320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frac{1}{4}$ · 字数 48,000

1965 年 2 月第 1 版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26 定价(七) 0.32 元

印数 0,001—3,000

出版者說明

《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和实践》一书写于一九〇五年，是伯恩施坦应《莱茵日报》的邀请，对《科伦日报》编辑罗伯特·布伦胡伯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四日在该报上以《今日的社会民主党》为题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的答复和说明。在这本小册子里，伯恩施坦以与资产阶级代言人论战的形式，在许多问题上重申和进一步宣扬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鼓吹按照他的观点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

书中首先否定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说企图证明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不可能性和可实现性，都同样是幻想，同样是不科学的。

接着，伯恩施坦转而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他借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际上曾承认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历史发挥着强大的影响”，便说“他们两人并不是严格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同时重申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严格地唯物主义的——在唯物主义的哲学意义上讲，而主要是经济的历史观”，并声称这是他和与他论战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共同观点。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改’更广泛详细得多”。伯恩施坦的这本小册子也正是以大部分篇幅来从这个方面进行“修正”的，而其手法则仍是“竭力用‘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列宁语。以上均见列宁：《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下同。）

在这本小册子里，伯恩施坦对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集中化理論和貧困化理論直到危机学說和崩潰論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和否定。他不仅攻击馬克思的資本日益集中的學說在农业方面“是錯誤的”，而且大量援引資产阶级的統計材料，宣传股份制度日益促使資本分裂，并說什么“股份制度已經使积累理論变得面目全非”了。

对于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价值學說和剩余价值學說，伯恩施坦宣称他“有異議”，說什么他們“計算出剩余价值的方法与馬克思不同”；同时吹捧直接掌握企业的資本家是高級脑力劳动者，是最善于管理社会和組織社会生产的人。照他說来，只有坐食紅利的股东和搜刮地租的地主才是剩余价值的剝削者。

列寧指出：“在危机論和崩潰論的問題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內，只有最近視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馬克思學說的基础。”伯恩施坦正是这样的人。他振振有詞地說道：“危机是否……‘范围越来越广泛，为害越来越严重’，危机之間的間隔是否就像馬克思所估計的那样越来越縮短呢？今天，如果根据經濟危机史來对这个問題加以一番考察，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他說这是由于企业的集中以及企业組成了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式的壟斷性质的組合，而“壟斷組織总的來說已經越来越显出一种与内燃机里調節燃料爆炸情況相仿佛的对市場調節的趋势：不断发生爆炸，但是不让任何一次爆炸获得尽量展开的机会。”于是，他得出結論，說帝国主义阶段資本主义經濟的适应性提高了，“危机理論不能成立”了，崩潰論也因而无法成立了。

在把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发展和灭亡的規律的學說歪曲成“經濟崩潰論”后，伯恩施坦声称：“如果經濟崩潰不是一种必然性，那么社会危机也就不是一种必然性”，資本主义社会“可以繼續发

展下去而不致发生崩溃”，“社会灾难”（即革命危机）也就不是一种“内在的、也即在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性了”。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伯恩施坦在大肆美化吹捧“普选制”、“民主”和鼓吹社会改良的同时，竭力鼓吹改变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他重弹苏黎世三人团的老调，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不能单单由工資劳动者組成，而要包括“非工資劳动者”；党的领导不能是工人阶级的“較下层的、落后的、沒有联系的分子”，领导权要掌握在“这个阶级的上层，在地位上相对說来最优越的、思想水平最高的、最有組織的分子，換句話說，就是这个阶级的貴族”的手中。他說，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不会像《科伦日报》編輯所說的那样分裂为激进派和溫和派，而是一个統一的“文化的党”，是自由主义的“一切伟大而有成效的成果的继承者和发揚者”。他宣称，工人阶级今天正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嘴高呼：只有“鏟除一切政治上的阶级特权”才会“保证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社会进化”。

本书是根据慕尼黑比尔克出版公司德文第二版譯出的。

目 次

序 言	1
一、問題的提法	2
二、《科伦日报》所承认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5
三、《科伦日报》还承认的。集中化理論和貧困化理論。	12
四、《科伦日报》所反駁的。积累理論。	15
五、《科伦日报》还反駁的。价值理論和剩余价值論、危机 学說、崩潰論。	24
六、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	30
七、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社会发展	38
附录：布伦胡伯博士、修正主义和爱尔福特綱領。	51

序　　言

这本小册子的主要部分是由六篇文章組成的，这些文章是我³应《莱茵日报》編輯部的邀約、为了答复今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四目的《科伦日报》上所发表的連載文章《今日的社会民主党》而撰写的。鉴于刊登这些文章的地方（德国最有影响的報紙之一的首要地位）以及这些文章中所显示出来的意图（想凭借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領域的較深入了解来认真而具体地同社会民主党进行辯論）这两者，似乎應該由我們（即使不說这两者要求我們）提出一个至少能強調各項主要問題的、同样如此具体的答复。当然，由于工人報紙的篇幅有限，无法对于《科伦日报》上所論及的全部問題一一詳加探討；某些有关社会主义理論和社会生活的有趣的問題只得不予論述了。我所关心的是用尽可能通俗的論述来向范围更广泛的讀者阐明《科伦日报》就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和实践所表示的承认和异議的意义何在，并且結合着这一点来探討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尚未解决的若干爭执的重要意义。

由于上述意图以及由于自从我的答辯文章发表以来《科伦日报》的上述文章在經過不大的补充之后已刊印成單行本出版这一事实，我似乎應該現在也把我的答辯文章刊印成單行本或小冊子問世。因为加上了我对《科伦日报》文章的單行本^①的批判并且还

① 单行本的书名是《今日的社会民主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依据所作的批判性的評价以及对其实际政党状况所作的社会学上的考察》。作者：科伦日报編輯、科伦商学院讲师罗伯特·布伦胡伯博士。古斯塔夫·費歇出版社一九〇六年耶拿版。

在好几处作了一些在我看来是必要的补充，所以我的单行本或小册子的篇幅有所扩大；同时我还认为在此可以删去某些对于报纸读者来说无法省略的重复以及其他一些由于初次刊登的形式而必不可缺的前后连载交接处的说明。而且我还认为在体裁语句方面应当作某些改动。但是，在这些论文的主要论点方面，当然是没有什么要改变的。

爱·伯恩施坦

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于柏林雪纳贝格区

5

一、問題的提法

O wad Some pow'r the gieftie gie us
To see oursels as ithers see us.

Robert Burns①

社会民主党現在沒有什么理由要用苏格兰民間詩人的話來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灵乞求这样的天才：使“我們能像別人看我們那样地看我們自己”。“別人”是一心一意想要使社会民主党被这句话所打动。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批评的书刊文章，已經多得可說是汗牛充栋了。当然，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批评像彭斯的警句詩篇的下文中所說的那样，是为了使我們不犯“許多大錯”；绝大部分是肤浅的、在論述时避开核心問題的文章，因此几乎不能对社会主义者产生影响。虽然如此，有时还会出現一些較深入地涉及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論文；我們就这些論文来进行探討，是只会有好处的。如果这些文章促使我們注意到社会主义學說需要改正之处，

① “願神灵賦予我們这种天才：能像別人看我們那样地看我們自己。”——罗伯特·彭斯”。按彭斯是著名的苏格兰民間詩人。——譯者注

那末好处就显而易見了。即使我們最后認識到，甚至这种探討也沒有得出任何確能成立的論点来反对社会主义學說，那末，这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敌人愈强大，对敌人的思想斗争就愈加能促使內部陣營加強。

《科伦日报》从今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四日发表了十三篇大多占有几栏篇幅的文章，其中論述了社会民主党书刊文章里涉及理論和斗争的思想內容。我們即使对敌人也應該說實話；因此我們必須承认，就其笔調和結構而言，这些文章不愧是由一家大报所发表的。无论我們在其他方面恰恰要对《科伦日报》提出何等多的指責，我們在这里只能开給它一紙贊揚证书。这些文章里貫穿着精神高尚的气质。作者不采用小处斤斤計較的办法，他不在次要問題上糾纏，而是大刀闊斧地直接触及核心問題——即他根据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性的文件所了解到的核心問題，同时他在轉述这些文件的內容时大多讲得确切中肯。由于上述理由，就只能越发促使我們起而接受挑战。一个事业的优越性，不能在同无知的人和伪造窜改的人所进行的論战中、而只有在同那些有专业知识并且依据事实来进行推理的对手們所进行的論战中才能获得证明。

因此，我們将在下列諸文中对《科伦日报》展开論战。首先，要就問題的提法作若干点說明，因为，如果对于那些最終要涉及的諸問題的性质沒有共同的理解，那末辯論就会有陷入毫无結果的爭执不休的危险。

我們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核心問題是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斗争运动，其目的在于取消資本主义的經濟和社会制度并且代之以一种能消除資本主义經濟的如下两点典型特征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消除人对人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消除經濟关系对人的支配；这种經濟关系正如市場变化那样，本身也仅仅是人为

制度的产物。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最概括的叙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在这些目标上是没有意见分歧的，也不可能设想会有意见分歧。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首先不是诉诸感情，而是诉诸理智，也即启发那些在目前状况下的受苦受难者——因此首先是那些一无所有的工薪劳动者的关心，并且还唤起那些认识到这个遭到反对的社会制度不能持久存在下去的人们的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诚然还有伦理学上的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之下，这些因素只居次要地位。现代社会民主之所以提出它特有的要求，其理由并不是基于抽象的正义感的观念；现代社会民主的这些要求的正义性乃是基于历史性的、以当代特殊经济和社会条件为依据的理由。对此可具体说明如下：社会主义并不这样說，资本主义必須消灭，因为有些人是资本主义企业主而其余的人是工薪劳动者，这是不合理的現象；社会主义倒是这样說的，**資本主义在今天是不合理的，必須予以消灭**，因为把人們分成**资本家和工薪劳动者两类**，这种区分，在我們时代的經濟和社会条件之下已变得越来越沒有道理了。只有在社会主义能证明后一种說法的情况下并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內，社会主义才是根据它本身的理論上的基本概念而在科学上成为有根据的。因此，这就是检验其學說正确性的試金石。

但是，对于理論家來說，显而易見，为了防止錯誤的解释，應該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強調指出：如此提出的問題本身还没有涉及现代工薪劳动者爭取政治权利和爭取改善经济社会地位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历史事实，它作为这样的事实，**本身就是正当的**。因此，作为这种斗争的体现者和承担者，社会民主主义即使在未能就上述那一点提出证明的情况下依然是有根据的。这样一来，别人有疑問的恰恰只是这个运动的特定的社会主义最終目的——如果在这里姑且使用这个用語的話。实际上，《科伦日报》的批评

也就是集中于这一点的。不过它沒有像欧根·里希特^①那样力图 7
用关于未来的幻想图景来证明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不可能性。这
种做法同那种想用幻想图景来证明未来国家的可实现性的尝试一
样都是不科学的。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诚然可能已經发现一些問
題——就这一点来讲，甚至里希特的未来图景也不是完全沒有价
值的——但是科学的论证以及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所應該探討
的，不是未来国家具有的形式問題，而是朝向未来国家的发展問題，
不是这种国家的美滿性，而是它的历史的必然性或高度可能性。

《科伦日报》是在这种較深刻的意义上提出这个問題的。我們
不妨看看，它如何解答这个問題。

二、《科伦日报》所承认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资产阶级方面对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起先，资产阶级在論述方面的代言人致力于反駁社会主义者为了論证社会主义理論和要求而提出的几乎全部論点。譬如說，凡是了解拉薩尔在文字上的論爭情况的人都会記得，每逢拉薩尔为了进行論述而援引资产阶级理論老前輩們的話时，拉薩尔的资产阶级敌人甚至会馬上就否认他們自己的这些老前輩。这些敵人中的个別人当初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甚至抵賴自己以前所讲过的话。拉薩尔曾抓住过关于这种情况的几个絕妙的实例，这种实例不难再举出許多。但是，漸漸出現了这样一些人，他們聪明到能

① Eugen Richter，一八三八——一九〇六，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德国自由党創始人，主张自由貿易政府，反对社会民主党，同时也反对俾士麦。——譯者注

够懂得，如今用这种办法毕竟行不通了。学术界人士尤其感觉到有这种需要：較认真地同社会主义展开辯論。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以后，由于工人方面运用了結社权，由于被选入議会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了立法工作，整个社会主义問題的面貌已經改观；这种情况使那些学术界人士更加容易实现上述的打算。这时，就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給予某些承认，而又不致于被看成是拥护如此值得怀疑的做法——譬如由国家来资助生产合作社——的一种揭发主犯罪行的共犯。于是就开始了讲坛社会主义的时代，这种社会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朗格^①之流、謝夫勒^②之流、宣貝格之流——甚至还頗为迎合社会主义。

这些人的同道者的大多数当然只是滿足于——正如魯道尔夫·迈耶尔有一次很俏皮地描述的那样——“在副刊栏里漫談馬克思”而已，这就是說，只是在这一栏里空談馬克思在关于工厂检查和法定劳工保护的論述中所提出的要求，而把馬克思的书里所提出的影响深远的問題以及理論上的发展撇在一边，不予理会。社会党人法造成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形势使那种同时恰恰由魯道尔夫·迈耶尔所宣扬的对洛貝图斯^③的崇拜获得了发展，然后又带来了謝夫勒的《社会主义前途黯淡》，最后以尤里烏斯·沃尔夫的《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书为其最高峰，这是到那时为止对馬克思最尖銳的批評。沃尔夫的书里对于馬克思在经济发展方面所作的預測几乎全部表示怀疑。就在这个时期，凡是这本书流传所及之处，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从另一方面——譬如保

① F. A. Lange, 一八二八——一八七五，苏黎世大学和馬尔堡大学哲学及经济学教授。——譯者注

② A. E. F. Schäffle, 一八三一——一九〇三，土宾根大学和維也納大学 經济学及社会学教授，曾任奥商务大臣。——譯者注

③ J. K. Rodbertus, 一八〇五——一八七五，德国資产阶级经济学家，主张实行保守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譯者注

尔·巴尔特等等——遭到了攻击，而且奥英两国的边际效用論者——他們反对馬克思的价值論——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对馬克思的反駁，越来越时髦起来了，而且还变成了好玩的事，当时在社会民主党自己的行列里也有人对馬克思主义的各项結論提出了异议。这种潮流在一八九九年以保尔·魏逊格林的小册子《馬克思主义临近末日》而达到了頂点；当然，这本书除了证明其作者当时还是一个很幼稚的指导者^①之外沒有证明任何其他东西。

从此以后，就出現了一种反作用（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上述的那种夸大其詞的批評），可以把这种反作用称为对馬克思主义的挽救时期。专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們站了出来——有些人在这一点上，另一些人在那一点上——认为馬克思毕竟还是有道理的。如果用交易所里的术语来讲的話，就是馬克思股票的行情又上涨了。

《科伦日报》的这些文章也是在这种反作用的形势下发表的。这位作者力图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年来关于馬克思的討論作一番总结并且在这方面得出一种結論；这种結論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十分坚决的敌人——因为我們将认识到他是这样的人——說来必須被称为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理論显然有利的正面評語。

他在序文里就強調了社会主义理論家們对科学所作出的功績。他进而闡述道，把社会民主主义贊許为由于其所引起的恐惧而积极地促进了社会改革事业的一种力量——正像俾士麦所做的那样——是不够的。据他說，纵然完全不談这种“无意之中的（！）实际功績”，“也應該比通常估計的还更高地估計它的**有意的功績**，即使这种功績是属于純理論性质的”。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生們的

^① 該书作者的名字 Weisengrün，倒置后恰巧成为 grüner Weiser（幼稚的指导者）。——譯者注

功績據說在於“客觀上丰富了我們的經濟文庫以及我們的科學思想”。他认为：如果責怪許多在思想界有重要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信奉者說：他們的做法不符合更高明的知識；这是不行的，毋寧說倒“有必要對他們的科学信念作一番科学上的評價”。而且據說人們同时还應該記住勞伦茨·施坦因的这句漂亮話：“社会主义的导师們在追求其目标时所表現出的那种严肃性和深刻性，也許会使思想家們“对于在令人迷惑的这个世界上所出現的一些較大錯誤也予以寬容”。

那末，科学理論家們的**有意**的功績何在呢？首先，《科伦日报》的这位撰稿人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上是正确的。據說，馬克思由于他的加工，由于他不局限于研究人类的單純外表的行为而去揭示其行为的动力和根源，从而“对历史哲学作出了迄今最重要的貢獻”。據說，这种由經濟来决定历史事态发展的理論誠然發揮得似乎过分了，但是虽然如此，馬克思理論的**最主要的功績**仍在于馬克思在那些对于其理論有典型意义的各方面提供了无情的見解，即“与迄今的科学观点迥然不同的敏銳的強調”。据他认为，馬克思的功績仍然在于：“在各項决定历史发展的諸因素中，使物质生产力获得了它的长期被忽視的、应得的头等重要地位”。这位撰稿人还认为，施塔姆勒^① 和图甘—巴拉諾夫斯基^② 等人的这种嘗試也是錯誤的：即为了克服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方面的片面性，而对物质生产力的概念提供一种較寬广的、精神上的、包括意志动力在内的解釋；他认为这样就会抹煞了它与以前的意識形态方面的历史观之間的区别；他还指責本文作者在馬克思的

① R. Stammller, 一八五六——一九三八，德国資产阶级法律哲学家。——譯者注

② M. J. Tugan-Baranowski, 一八六五——一九一九，俄国修正主义经济学家。
——譯者注

历史方法問題上把体系方面的缺点說成是其历史方法的全部內容。这些指責表明，他是何等地重視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主要是出于这一理由，我們才在这里提到上述的各项指責；此外，这里所涉及的問題在我們看来是足够重要的，因而需要加以专门的論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論述已經如此之多，以致关于这个問題的任何較新的批判性的論述都会引起这种嫌疑：仿佛是把已經讲过的話仅仅用新的形式或者經過重新拼湊之后再度提出。但是这一点完全不适用于图甘一巴拉諾夫斯基最近的著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础》一书中关于这个問題的論述。在这方面，这位俄国学者特別把他的真知灼見用于明确区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涉及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譬如“經濟”、“物质生产力”等等——的界綫，这是一項极有貢献的工作，因为迄今大多数关于这种理論的討論都在不小的程度上恰恰由于討論者在討論时所讲到的基本概念的含义十分不同而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甚至无法彼此了解。譬如說，如果两个人对經濟的理解各不相同，那末这两个人怎么能就經濟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取得一致看法呢？而且这两人愈是敏銳的思想家，那末他們就愈加必然地会陷于无法調和的矛盾之中。然而，基本概念的含义愈是明确，每次辯論就有希望获得愈加巨大的成果，就愈能賦与理論本身一种明确无誤的形式。

因此，我們在图甘一巴拉諾夫斯基的著作里所看到的这种概念区分是有其必要性的。我們的这位作者則在論述时一会儿承认这一点，一会儿又对它如此地橫加責备，以致几乎能逼得別人喊救命。图甘一巴拉諾夫斯基严格地区分了如下两方面：即一方面是**經濟**，这是那种以現實的（最好說：物质的）外在世界为对象的活动的总和，这种活动的目的在于为滿足人类需要而創造現實的条件；另一方面是**这种需要的本性**，这整个說来就是經濟行为的动机和

动力，这种动机和动力可以是而且大部分总是十分非經濟性质的或是同經濟性质不相容的，意識形态性质的或是粗野动物性质的。为了反对上述如此合理和必要的概念区分（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对于經濟諸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加以符合实际情况的估价），我們这位作者除了提出下列这句話之外沒有提出任何更有理由的論点：“在我們看来，这种理論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存在着許多并不引起任何經濟活动的心理上的动力，甚至像性欲冲动这样强烈的动力也根本不必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經濟活动。”
(单行本第37頁)

好吧，我們必須請問，图甘一巴拉諾夫斯基在哪里提出过在此归咎于他的那种荒謬主张；是用什么巧妙的邏輯才能从他的理論中推論出这种荒謬主张的呢？同經濟不相容的动力和动机能够引起而且确实是在常常引起經濟行为，或者援用我們这位作者自己的話來說，“理想的动力也会产生經濟活动”，这种說法毕竟还不等于說这些动力仅仅产生經濟活动吧？这位作者在引伸图甘一巴拉諾夫斯基的論断时擅自把“仅仅”这个詞解释进去，从而几乎导致这种論断誤入其相反的方向。如果一位正在恋爱的少年为了取悅被他追求的女郎而賦詩作詞，那末他还沒有因此而实现了經濟活动；这一点道理連稍为有一点判断能力的人也許都会懂得；責备一种如此严密地确定了經濟活动概念的理論——就像图甘一巴拉諾夫斯基的理論那样——沒有包含上述道理，这是无法用任何理由来辯解的在邏輯上的牵强附会。

如果说这位作者在这里把“仅仅”二字随心所欲地解释到一个定理里去，从而完全破坏了这个定理的意义，那末他又用如下的做法对另一个命題作了錯誤的解释：即他对于該命題中所含有的若干限定性的附加語完全不予理会。这就是本文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的前提》一文中的这句話：“因此，把唯物主义轉用于解释历史，